



元代馆阁文人活动系年

The Annals of Central Government Literati's
Activities in the Yuan Dynasty

邱江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元代馆阁文人活动系年

The Annals of Central Government Literati's
Activities in the Yuan Dynasty



邱江宁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夏 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馆阁文人活动系年/邱江宁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4712-3

I. ①元… II. ①邱…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元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2223 号

元代馆阁文人活动系年

YUANDAI GUANGE WENREN HUODONG XINIAN

邱江宁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9.5

字数:880 千字 印数:0,001-1,000 册

ISBN 978-7-01-014712-3 定价:12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目 录

绪 言	1
元太宗窝阔台汗七年 宋理宗端平二年 乙未 1235 年	24
元太宗窝阔台汗八年 宋理宗端平三年 丙申 1236 年	25
元太宗窝阔台汗九年 宋理宗嘉熙元年 丁酉 1237 年	26
元太宗窝阔台汗十年 宋理宗嘉熙二年 戊戌 1238 年	28
元太宗窝阔台汗十一年 宋理宗嘉熙三年 己亥 1239 年	29
元太宗窝阔台汗十二年 宋理宗嘉熙四年 庚子 1240 年	29
元太宗窝阔台汗十三年 宋理宗淳祐元年 辛丑 1241 年	30
乃马真皇后称制元年 宋理宗淳祐二年 壬寅 1242 年	31
乃马真皇后称制二年 宋理宗淳祐三年 癸卯 1243 年	33
乃马真皇后称制三年 宋理宗淳祐四年 甲辰 1244 年	34
乃马真皇后称制四年 宋理宗淳祐五年 乙巳 1245 年	36
乃马真皇后称制五年 元定宗贵由汗元年 宋理宗淳祐六年 丙午 1246 年	36
元定宗贵由汗二年 宋理宗淳祐七年 丁未 1247 年	37
元定宗贵由汗三年 宋理宗淳祐八年 戊申 1248 年	39
海迷失皇后称制元年 宋理宗淳祐九年 己酉 1249 年	40
海迷失皇后称制二年 宋理宗淳祐十年 庚戌 1250 年	41
元宪宗蒙哥汗元年 宋理宗淳祐十一年 辛亥 1251 年	42
元宪宗蒙哥汗二年 宋理宗淳祐十二年 壬子 1252 年	45
元宪宗蒙哥汗三年 宋理宗宝祐元年 癸丑 1253 年	48
元宪宗蒙哥汗四年 宋理宗宝祐二年 甲寅 1254 年	49
元宪宗蒙哥汗五年 宋理宗宝祐三年 乙卯 1255 年	50
元宪宗蒙哥汗六年 宋理宗宝祐四年 丙辰 1256 年	52
元宪宗蒙哥汗七年 宋理宗宝祐五年 丁巳 1257 年	53
元宪宗蒙哥汗八年 宋理宗宝祐六年 戊午 1258 年	54

元宪宗蒙哥汗九年	宋理宗开庆元年	己未	1259 年	55
元世祖中统元年	宋理宗景定元年	庚申	1260 年	57
元世祖中统二年	宋理宗景定二年	辛酉	1261 年	63
元世祖中统三年	宋理宗景定三年	壬戌	1262 年	66
元世祖中统四年	宋理宗景定四年	癸亥	1263 年	69
元世祖中统五年	至元元年 宋理宗景定五年	甲子	1264 年	71
元世祖至元二年	宋度宗咸淳元年	乙丑	1265 年	74
元世祖至元三年	宋度宗咸淳二年	丙寅	1266 年	76
元世祖至元四年	宋度宗咸淳三年	丁卯	1267 年	80
元世祖至元五年	宋度宗咸淳四年	戊辰	1268 年	82
元世祖至元六年	宋度宗咸淳五年	己巳	1269 年	86
元世祖至元七年	宋度宗咸淳六年	庚午	1270 年	90
元世祖至元八年	宋度宗咸淳七年	辛未	1271 年	93
元世祖至元九年	宋度宗咸淳八年	壬申	1272 年	99
元世祖至元十年	宋度宗咸淳九年	癸酉	1273 年	101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	宋度宗咸淳十年	甲戌	1274 年	104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	宋恭帝德祐元年	乙亥	1275 年	108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	宋德祐二年 端宗景炎元年	丙子	1276 年	111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	宋景炎二年	丁丑	1277 年	119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	宋景炎三年 帝赵昺祥兴元年	戊寅	1278 年	123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宋祥兴二年	己卯	1279 年	127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宋祥兴三年	庚辰	1280 年	131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	宋祥兴四年	辛巳	1281 年	138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	宋祥兴五年	壬午	1282 年	148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	癸未	1283 年		154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	甲申	1284 年		157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	乙酉	1285 年		161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	丙戌	1286 年		168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	丁亥	1287 年		174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	戊子	1288 年		180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	己丑	1289 年		185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	庚寅	1290 年		191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辛卯	1291 年		194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	壬辰	1292 年		201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 癸巳 1293 年	207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 甲午 1294 年	213
元成宗元贞元年 乙未 1295 年	221
元成宗元贞二年 丙申 1296 年	227
元成宗元贞三年 大德元年 丁酉 1297 年	230
元成宗大德二年 戊戌 1298 年	236
元成宗大德三年 己亥 1299 年	243
元成宗大德四年 庚子 1300 年	248
元成宗大德五年 辛丑 1301 年	252
元成宗大德六年 壬寅 1302 年	256
元成宗大德七年 癸卯 1303 年	260
元成宗大德八年 甲辰 1304 年	266
元成宗大德九年 乙巳 1305 年	272
元成宗大德十年 丙午 1306 年	276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 丁未 1307 年	280
元武宗至大元年 戊申 1308 年	288
元武宗至大二年 己酉 1309 年	294
元武宗至大三年 庚戌 1310 年	299
元武宗至大四年 辛亥 1311 年	304
元仁宗皇庆元年 壬子 1312 年	317
元仁宗皇庆二年 癸丑 1313 年	326
元仁宗延祐元年 甲寅 1314 年	338
元仁宗延祐二年 乙卯 1315 年	351
元仁宗延祐三年 丙辰 1316 年	361
元仁宗延祐四年 丁巳 1317 年	369
元仁宗延祐五年 戊午 1318 年	375
元仁宗延祐六年 己未 1319 年	388
元仁宗延祐七年 庚申 1320 年	394
元英宗至治元年 辛酉 1321 年	404
元英宗至治二年 壬戌 1322 年	414
元英宗至治三年 癸亥 1323 年	423
元泰定帝元年 甲子 1324 年	433
元泰定帝二年 乙丑 1325 年	444
元泰定帝三年 丙寅 1326 年	451

元泰定帝四年 丁卯 1327 年	458
元泰定帝五年 致和元年 元文宗天历元年 戊辰 1328 年	469
元文宗天历二年 己巳 1329 年	477
元文宗天历三年 至顺元年 庚午 1330 年	495
元至顺二年 辛未 1331 年	513
元至顺三年 壬申 1332 年	522
元至顺四年 元统元年 癸酉 1333 年	528
元元统二年 甲戌 1334 年	538
元元统三年 (改至元元年) 乙亥 1335 年	546
元至元二年 丙子 1336 年	552
元至元三年 丁丑 1337 年	558
元至元四年 戊寅 1338 年	562
元至元五年 己卯 1339 年	570
元至元六年 庚辰 1340 年	582
改至元七年为至正元年 辛巳 1341 年	587
元惠宗至正二年 壬午 1342 年	599
元惠宗至正三年 癸未 1343 年	610
元惠宗至正四年 甲申 1344 年	616
元惠宗至正五年 乙酉 1345 年	627
元惠宗至正六年 丙戌 1346 年	639
元惠宗至正七年 丁亥 1347 年	647
元惠宗至正八年 戊子 1348 年	653
元惠宗至正九年 己丑 1349 年	661
元惠宗至正十年 庚寅 1350 年	669
元惠宗至正十一年 辛卯 1351 年	681
元惠宗至正十二年 壬辰 1352 年	686
元惠宗至正十三年 癸巳 1353 年	697
元惠宗至正十四年 甲午 1354 年	702
元惠宗至正十五年 乙未 1355 年	709
元惠宗至正十六年 丙申 1356 年	715
元惠宗至正十七年 丁酉 1357 年	717
元惠宗至正十八年 戊戌 1358 年	722
元惠宗至正十九年 己亥 1359 年	726
元惠宗至正二十年 庚子 1360 年	732

元惠宗至正二十一年	辛丑	1361 年	736
元惠宗至正二十二年	壬寅	1362 年	740
元惠宗至正二十三年	癸卯	1363 年	745
元惠宗至正二十四年	甲辰	1364 年	749
元惠宗至正二十五年	己巳	1365 年	753
元惠宗至正二十六年	丙午	1366 年	756
元惠宗至正二十七年	丁未	1367 年	759
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 (明太祖洪武元年)	戊戌	1368 年	761
参考文献			765
后 记			782

绪 言

对于元代主流文学研究而言,本著《元代馆阁文人活动系年》是一件必须进行的基础性工作。如果不能了解馆阁文人活动的国家社会文化背景,不知道馆阁文人的仕履作为,不理解馆阁文人包括国家著述和个人著述中所寄寓的意义,不熟悉馆阁文人活动交游的圈子,不掌握馆阁文人的生平基本情况,很难获得较为原生态的元代主流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也不可能走进元代主流文学的发展现场。而如果没有对元代主流文学发展基本面的把握,缺乏元代主流文学发展现场的文献支撑,那么也很难对元代文学进行综合的、中肯的考量。

治元代文学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基础性的问题,就是元代文学的断代应该从何时开始,这是本著《元代馆阁文人活动系年》首先想要解决的问题。在以往以汉族本位为中心的编年史、文学史中,往往以至元十六年(1279)陆秀夫背小皇帝跳海自杀,南宋彻底灭亡,才算元朝开始。而明馆臣所修《元史》,将元朝的起讫期定为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1206)到元惠宗退出中原(1368)这段时间。但是,1260年,忽必烈在以刘秉忠为首的一批中原儒士谋臣的辅助下,获得大汗之位,即位开平。即位之际,忽必烈改变蒙古大汗不立年号的做法,定年号为“中统”,所谓中朝正统的意思,并发布即位诏书,向中原百姓和士大夫正式宣告,自己不再仅仅只是蒙古大汗,同时还是中国新王朝的皇帝。^①中统五年(1264),与忽必烈争夺大汗地位的阿里不哥归降之后,忽必烈改年号为“至元”,取《易经》“至哉坤元”之意,至元八年(1271),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大元”,理论意义上的元王朝从这一年正式开始。不过,《元史·百官志一》在官制叙述的开端认为:“元太祖起自朔土,统有其众,部落野处,非有城郭之制,国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②在明人看来,蒙古国势力逐步挺进中原之前,成吉思汗统治下的蒙古国实行全民军事化,以千户为单位进行军事管理,将掠夺和征服视为最光荣的事业,国家处于随时战备状态。在灭金之前,蒙古游牧民族没有定居的习

① 陈高华、张帆、刘晓:《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153页。

② 宋濂等:《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七册,第2119页。

惯,文字载记也少,直至蒙古国势力逐步挺进中原,灭金之后,由于金朝文人的努力与渗透,蒙元王朝才逐渐由野蛮走向文明,吸纳中原定居民族的管理经验,逐渐定居、安邦。真正意义上的元代文学也就即此开始。明清人研究元代文学,则大抵从金亡(1235),直至明王朝建立(1368),几乎约定俗成。^①本著认同明清时期人们对元代文学起讫时间的界定,即从公元1235年、窝阔台汗七年、金朝灭亡这一年开始系年。

一、系年显示:与元代文化关系更密切的创作者是馆阁文人

元代文学的创作主体到底是哪些人群?据现今的文献整理情况来看,《全元文》共收录三千余位作者三万余篇文章;而《全元诗》共收录五千余名作者近十四万篇诗作。再有词作、曲作等其他体裁的大量作品,元代文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贫乏得只有杂剧。元杂剧兴起、繁荣于汉地世侯统治时期,繁兴至至元初没几年,而且地域范围也只局限于北方部分区域,在百余年元代文学发展的时空范围中,只占有其中的一小部分,真正与元代游牧民族统治下,多种文明、文化的主体特征,起伏浮沉,关系最密切的创作者一直是元代馆臣。从蒙元到元末,元代文学的创作主体一直是馆阁文人。

由于文化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元代文学创作主体在不同时期由不同地域的人群掌控,因此,关于元代文学的分期,学界迄今并没有定论。依据本著的馆阁文人系年,可以看到,1286年,忽必烈令程钜夫下江南访贤,此后,元代文坛成为南北馆阁共同主持的文坛,在此之前,元代文坛的主导地位基本由金朝过来的北方文人所把持。同时,本系年还显示,1286年之后,一直到1332年元文宗去世,是南北多族馆阁文人酬唱密集、统领元代文坛的巅峰时期;次年,元代文坛盟主虞集以眼病退归江西,从此元代文学进入晚期,文坛成为北方京师馆阁与南方民间文士共同活跃的文坛。根据本系年,我们大致可将元代文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蒙元时期(1235—1286)、元中期(1287—1332)、元晚期(1333—1368)。

根据系年的“背景”栏知道,1250年,蒙哥命令忽必烈主持漠南汉地事务,直到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获得大汗地位为止,这个时期是元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史称忽必烈潜邸时期。由于忽必烈潜邸于开平金莲川一

^① 邓绍基、杨镰:《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前言”第7页。

带,思大有为于天下,努力招募四方才能之士,当时,以刘秉忠为首,张文谦、郝经、姚枢、许衡、魏璠、窦默、王恂、宋子贞、商挺、赵良弼、王磐、王鹗等人聚于金莲川,这群人被称作金莲川幕府群,这群人多来自邢州、东平、真定、保定等地域。根据系年中“背景”栏内容可以看到金莲川幕府文人对忽必烈推行汉法,实现元代文化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型影响深远,他们也是元初国家制度的建设者和元初文学的主要创作者。例如,元代典型馆阁机构翰林国史院的建立。中统初,忽必烈刚建年号,推行汉法,只以王鹗为翰林学士,却未立官署,之后,在这个群体的推动下,至元元年(1264)始置翰林国史院,至元六年(1269)开始配置相应人员,而任职者以及所有国家著述活动基本是金莲川文人的子弟、门生。从至元八年(1271)的“仕履”栏可以看到,许衡这年拜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借助这一条的按语知道,许衡任国子监祭酒的职责是教授蒙古世胄子弟学习汉典,而为了很好地熏陶这些蒙古子弟,许衡又奏请门生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燠、孙安、刘安中十二人为伴读,这十二人中诸如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等人都在许衡之后成为馆阁重臣。袁桷曾感慨元初的馆阁基本为北人所据,认为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于“士上有以挽之,下有以承之”,“势使之然也”^①,由许衡及其弟子的任职情况就能理解袁桷的感慨。

根据本系年的“仕履”栏可以看到,到元代中叶,随着国家文化政策的调整,不仅南方大批优秀士子进入京师馆阁,更有西北子弟舍弓马而事诗书,逐渐进入文化阶层,于是北方金朝文臣独据文坛的情形大为改观,而国家承平的社会背景也为南北多族士人提供了广泛的交游空间,集结成元代中叶笼据最多文化资源、掌握绝对文化权力、规模相当齐整的馆阁文人群,他们也是促成大元文学特色形成的创作主力。从系年中我们可以看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在南方馆臣程钜夫的多方斡旋与进谏下,忽必烈终于特命用蒙古字、汉字书写访贤诏,令程钜夫江南访贤。这一年,赵孟頫以程钜夫江南访贤之举而入仕元廷。赵孟頫出仕北廷的意义在于,真正掀起南方士子北上大都的热潮,此后张伯淳、吴澄、袁桷、虞集、贡奎、杨载、范梈、揭傒斯等南方世家子弟和优秀士子纷至北廷。忽必烈之后,其孙元成宗在文化政策上颇有动作,这在系年的“背景”栏清晰地反映出来。而成宗时期(1294—1307)馆阁文人的“仕履”、“著述”、“生平”等栏条目及按

^① 袁桷:《送程士安官南康序》,李军、施贤明、张欣校点:《袁桷集》,吉林出版集团·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80页。

语信息也综合地反映出成宗时期的文治成效,对于元代文学而言,一个南北多族馆阁创作群正慢慢形成:像色目官员不忽木;北方文臣阎复、姚燧、王约、高道凝、胡祇遒、王恽、王构、雷膺、陈天祥、畅师文、刘致、卢挚、刘敏中;南方馆臣程钜夫、赵孟頫、袁桷、张伯淳、吴澄、邓文原等,已然颇具规模。根据系年“背景”栏,还可以看到,延祐元年(1314),在以李孟、程钜夫等文臣的推动下,开始实行科举考试,直至1368年,科考断断续续共进行了16次,选拔出一大批优秀士人,他们基本成为元代中、晚叶的文坛中坚和文化主导力量。再据系年“背景”栏,泰定元年(1324)泰定帝接受江浙行省左丞赵简建议将经筵进讲形式制度化,这是元代文化建设中非常具有标志性的进步,张珪、忽都鲁都儿迷失、吴澄、邓文原、虞集、王结、张珪、许师敬、买驴、曹元用、赵简、赵世延、阿鲁威、吴秉道、段辅、马祖常、燕赤、李术鲁翀等南北重要馆臣和官员都曾参与进讲^①,经筵进讲虽然多数情况下流于虚文,但它的存在对于南北多族文人的融合颇有意义。此外,天历二年(1329),元文宗成立奎章阁学士院对元代文坛是件大事。据此条按语知道,由于元文宗对奎章阁学士院的重视,该机构“非尝任省、台、翰林及名进士不得居是官”^②。从系年可以知道,奎章阁学士院兴于1329年,亡于1340年,这期间,由馆阁仕履情况可以知道,奎章阁学士院除了有跟脚的蒙古、色目人之外,拢聚了以虞集、揭傒斯、宋本、李洄、康里巎巎、赵世延、忽都鲁都儿迷失、阿邻帖木儿、欧阳玄、苏天爵、许有壬、柯九思、杨瑀、王守诚、阿荣等一批绝对堪称元代南北一统后成长起来的最优秀的各族、各界文化精英。而借助1329年—1340年间馆阁著述情况以及相关条目的按语文献,还能发现,由于奎章阁文人群体在创作上的积极推动,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元代诗文创作的繁荣,而且消除了馆阁文人间的南北文化隔阂,打通了馆阁与山林之间的消息,大一统的元代文学创作展示出不容忽略的独特魅力。

元代晚叶,杨维桢崛起于东南。借助系年背景可知,杨维桢是泰定四年(1327)、李黼榜的进士,他的同年诸如萨都刺、黄清老、刘沂、燮理溥化、郭嘉、张以宁、李黼、蒲理翰、观音奴、索元岱等多在朝中担任过馆臣,而由系年中馆阁文人的著述与交游情况可以知道,大都文坛馆阁文人在当时的全国文坛依旧具有相当的影响,杨维桢为首的南方民间文人圈也与京师馆阁

① 魏静:《泰定初年扈从上都经筵官虞集之官职考释》,《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② 揭傒斯:《送张都事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二十八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

文人保持密切关系。再根据系年可以知道,元末著名诗人迺贤在至正间被召为翰林编修,不过在至正初,他的诗集试图获得巨大影响还是借助了馆阁文人的推誉,其时,危素、欧阳玄、揭傒斯、张起岩等都不遗余力地推重其《金台集》,使得迺贤在元末文坛影响非凡。总之,由馆阁文人的活动系年,综合考量他们的仕履作为、著述情形以及交游圈子则能知道,元代晚期的文坛,馆阁力量与民间力量虽有持衡的趋势,但究其关联,馆阁文人的主导力量依旧相当大。

系年显示,元代中叶,由于国家文化政策的调整以及天下治平的社会背景,由北方金源文人把持的文坛格局大为改观,一大批来自南北多族,优秀的馆阁作家,扛起元代文学创新的大旗,借助系年中大量条目按语的文献信息可以看到,最具元代文学特色的创作、题材、审美倾向、表达方式是这个时期的馆阁文人贡献的,他们中诸如赵孟頫、袁桷、虞集、揭傒斯、杨载、范梈、贯云石、张养浩、黄潜、柳贯、马祖常、欧阳玄、宋本、苏天爵、康里巎巎、许有壬、泰不华、萨都刺等人尤其活跃,是了解和研究元代文学绝不能绕开的人物。元代晚期,随着大都北廷统治力量的衰弱,以杨维桢为首的江南地域文人群异军突起,大有取代京师馆阁文人领导地位的趋势,但包括杨维桢本人也不承认他与京师馆阁关系的疏离,更何况,杨维桢本人就是元代中叶、泰定四年的进士,这个时期的文坛是南北文坛共相发展、馆阁与山林保持密切往来的文坛。通过馆阁文人活动系年,借助精细、丰富、系统的文献呈现,文人群体的南北传递时间、各个文人的出道时间、文人群的交游圈子、创作繁荣时期以及主要创作倾向、创作题材了然。

二、根据系年:元代文学的特色是多民族、多文化形态的混融

元代文学最主要的特色是什么,研究界尚无定论。研究界曾经认为元朝统治时间短暂,统治者不懂汉文化,文明程度相对高的汉人、南人地位低下,所以元朝社会黑暗,文化事业衰微,文学创作成绩不尽人意。但通过馆阁文人活动系年,借着多元且丰富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可以知道,以往对元朝的许多认知可能包含着汉族本位思想的理解,也可能只是站在农耕文化、文字文明等单维向度思考问题。元王朝的特点在于它是蒙古游牧民族统治的南北一统、疆域空前辽阔的大一统王朝。与这一王朝文化背景相呼应的元代文学主要特点可以用“多元混融”四个字来概括。“多元”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就疆域范围、人口种群,还是物种特色以及信仰差异而言,元

代的多元特征都是“旷古所未有”^①。“混融”特征也是必然的,作为游牧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元王朝在统治方针与政策制定理念上都体现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明,游牧特质与农耕文化交错共存的特征,而且北方游牧民族不善生成、管理的本性,使其对南方农耕地域的粮食有深刻的依赖性。为拓通南北运输渠道,元代海运相当发达,号称“一代之良法”^②,海运的盛衰甚至最终决定了元王朝的存亡,某种程度而言,元王朝社会文明表现出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以及海洋文明多维共生,但糅合不是很完美,从而呈现出多种文明胶着混融的特点。元代文学在三种文明形态的基础上发展,自然也具有多元混融的特色;而且,不仅是多文明形态对元代文学多元混融特征的形成综合影响深远,每一种文明也在整个元代社会多元混融的文化背景中促使元代文学多元混融特征的形成。

根据系年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游牧文明对元代文学多元混融特征形成有深刻影响。元王朝作为从草原本位过渡到汉地本位的大一统王朝,草原本位的意识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中一直都具有决定性影响,这直接导致了元王朝大都、上都两都巡幸制度的确立。上都是忽必烈发迹之处,从政治、军事的角度而言,“世祖皇帝建上都于滦水之阳,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但大都对于中原内地的控制又极为有利,基于这样的情况,从世祖中统四年(1263)开始,“大驾岁巡幸”^③,直到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攻陷上都,“因上都宫阙尽废,大驾不复时巡”^④为止,元王朝的两都巡幸制共持续九十五年。由于皇帝每年必须巡幸上都,而且一待就是四个月乃至半年以上^⑤,“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⑥以此,从1263年的系年开始,就能看到百司在上都逐渐设立分院的进程,而馆阁文臣们也在职事生涯中,需要到上都任职。借助系年中馆臣们的著述、唱和以及相关条目的按语内容知道,两都巡幸制这一国策的制定与执行在深刻影响元代政治格局,迫使大批馆臣、僧侣往来于向来游牧民族

① 戴良:《皇元风雅序》,《全元文》第二十九册,第293页。

② 宋濂等:《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第八册,第2364页。

③ 虞集:《贺忠贞公墓志铭》,《全元文》第二十七册,第510页。

④ 王祚:《上京大宴诗序》,《全元文》第五十五册,第292页。

⑤ 按:忽必烈开始巡幸制那年(中统四年,1263)乃二月十三日由大都启程,八月二十五日返回大都,以后则多于二月出发,九月返回,武宗海山时将时间定为三月至九月,但习惯汉地生活的仁宗、文宗、顺宗等则尽量缩短在上都的时间,往往四月甚至五月由大都出发,八月回到大都。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9—60页。

⑥ 黄溍:《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王颉点校:《黄溍全集》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89页。

活动的腹心地域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元代文学创作上的多元混融特征形成。

应该指出的是,上都作为游牧民族活动的草原极北地域,完全保留蒙古旧俗,以此当内阁馆臣作为扈从人群来到上都之后,上都所具有的北地风情、蒙古游牧特色,成为极具创作空间的对象。例如,从著名馆臣袁桷的“仕履”活动知道,袁桷“在词林几三十年,扈从于上京凡五”^①,而袁桷也将自己从延祐元年(1314)到至治二年(1322)四次扈从上京之行咏之于诗,遂有《开平集》四集,并每每与同僚唱和,以此,虞集、马祖常、揭傒斯、欧阳玄、王士熙、许有壬、胡助、黄潜、柳贯、周伯琦等馆阁重臣都有不少有关上京纪行的吟咏。值得一提的是,据1330年系年中“交游”栏知道,胡助作《上京纪行诗》五十首,在京师录为一卷,然后送给同道者删题。又据这条的按语文献知道,当时有吕思诚、王士点题诗,虞集、王守诚、王士熙、苏天爵、王理、黄潜、字术鲁翀、吕思诚、陈旅、曹鉴、吴师道、王沂、揭傒斯等题跋,几乎将其时著名的馆阁文臣一网览尽。再根据系年综观延祐、天历时期的馆臣交游情形,知道其时品题风气甚浓,正是这种馆阁间同题唱和的酬答风气非常顺理成章地将以“上京”为主题的创作题材推向高潮。在元代,由于馆阁文臣们对上京纪行诗的热咏,引发了几乎整个元代文人都曾参与到上京纪行诗的写作、赋和、阅读、评价和传诵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上都纪行诗创作的热兴,不仅意味着一个新的创作增长点的形成,它更昭示着元代文学创作南北多元混融特色的形成。

通过系年,我们还可以看到,元王朝典型的游牧文明特色不仅在政体上改变和影响元代文学的创作特色,而且在精神意识层面上也深刻地影响着元代文学多元混融特色的形成。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对文字文明缺乏兴趣,宗教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②元蒙统治者对于宗教的亲近态度使得一些有识的宗教人士借助宗教外衣推动元王朝的文明进程和文化发展。像耶律楚材对于大蒙古国的文明开化意义;刘秉忠之于元王朝的建邦立制意义。再如属于大元王朝的蒙古新字是由藏传佛教的高僧八思巴创立的;而南宋著名学者马端临的大型类书《文献通考》是延祐六年(1319)通过玄教高层王寿衍的举荐而得到元廷的重视,从而以官资、官刻的方式出版,进而产生重要影响,等等。宗教在推动元王朝文明进程的同时,也凭借自己的

① 苏天爵:《元故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袁文清公墓志铭》,《全元文》第四十册,第389页。

② 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绪论”第8页。

政治优势在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文化领域发挥影响。

借助系年中丰富的按语内容,我们知道蒙古族在侵入中原之前,主要信奉萨满教,蒙元统治者对其他宗教的理解都是萨满教化的,以此,元王朝在官制设立上对于宗教的偏重,宗教人士与馆阁文臣被统治者以同等而稍高的待遇存在,儒家也被蒙古统治者视为一种宗教。据1238年系年“背景”栏知道,这年举行戊戌选试,而该条目的按语告诉人们,此次选试实质是大蒙古国为确定当时儒、释、道三教的人数与待遇进行的“汰三教”行动的重要一环^①,儒生与僧道一起以宗教人士的身份参加考试。^②由1288年系年“背景”中宣政院改名原因的按语,我们还看到,在元代,被奉为国教的藏传佛教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领袖被奉为帝师,元廷特设宣政院主管藏传佛教事务。而1284年“背景”栏中集贤院的职能还告诉我们,在元朝统治者看来,学校教育、玄门道教、占卜问卦等事情的地位与性质相当,集贤院便是主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等事的典型馆阁机构。元代统治者对待宗教人员和儒学文士的态度使得元代的宗教人士与馆阁士人关系混杂而密切。而综观系年中南北馆阁文人的著述、交游情形,更能感到宗教人员对于在南北馆阁文人所起到的斡旋、捏合意义。例如,在元初至元代中叶,临济宗主持雪堂上人的禅院天庆寺,一直都是馆阁高层聚会、唱和的场所。借助系年的按语,我们知道元初著名的“雪堂雅集”,不仅唱和多篇,推动了南北馆阁文人的融合,而且即此带动元代自馆阁高层到民间文士的雅集热情。根据系年中的人物生平介绍栏知道,由于宗教人士与馆阁人员的混融,元代许多重要作家来自宗教界人士或信徒,在佛教界,除了元初两位重臣耶律楚材、刘秉忠外,像早期的中峰明本、中叶的释大訢、晚期的宗泐;道教中,早期如全真教的丘处机、李志常、尹志平等,中叶玄教的吴全节、朱思本、薛玄曦等,茅山派的张雨等;还有许多奉信伊斯兰教的回鹘士子,诸如高克恭、不忽木,信奉基督教的马祖常、丁鹤年,等等。

最意味的是,元代主流文学由于宗教力量的强大而不可避免地大量涌入宗教方面的内容。这其中最直观的便是,馆阁文人无论是职业著述还是个人著述活动中,都有大量的宗教寺庙碑和塔铭、碑记等。出于对宗教的迷信心理,蒙古皇室、蒙古贵族在寺庙建筑上挥金如土,即使是汉化程度最高的元文宗,由于害死兄长而获得皇位的阴影使他在位的五年几乎都在修

① 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② 安部健夫:《元朝的知识人与科举》,参见涂冰:《从〈庙学典礼·丁酉诏令〉看戊戌选试》,《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8年第2期。